

# 重门之御

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

陈贤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重门之御

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

陈贤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门之御：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 / 陈贤波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5325-8600-4

I. ①重… II. ①陈… III. ①海防—研究—广东—明代  
IV. ①E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2773号

## 重门之御

——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的转变

陈贤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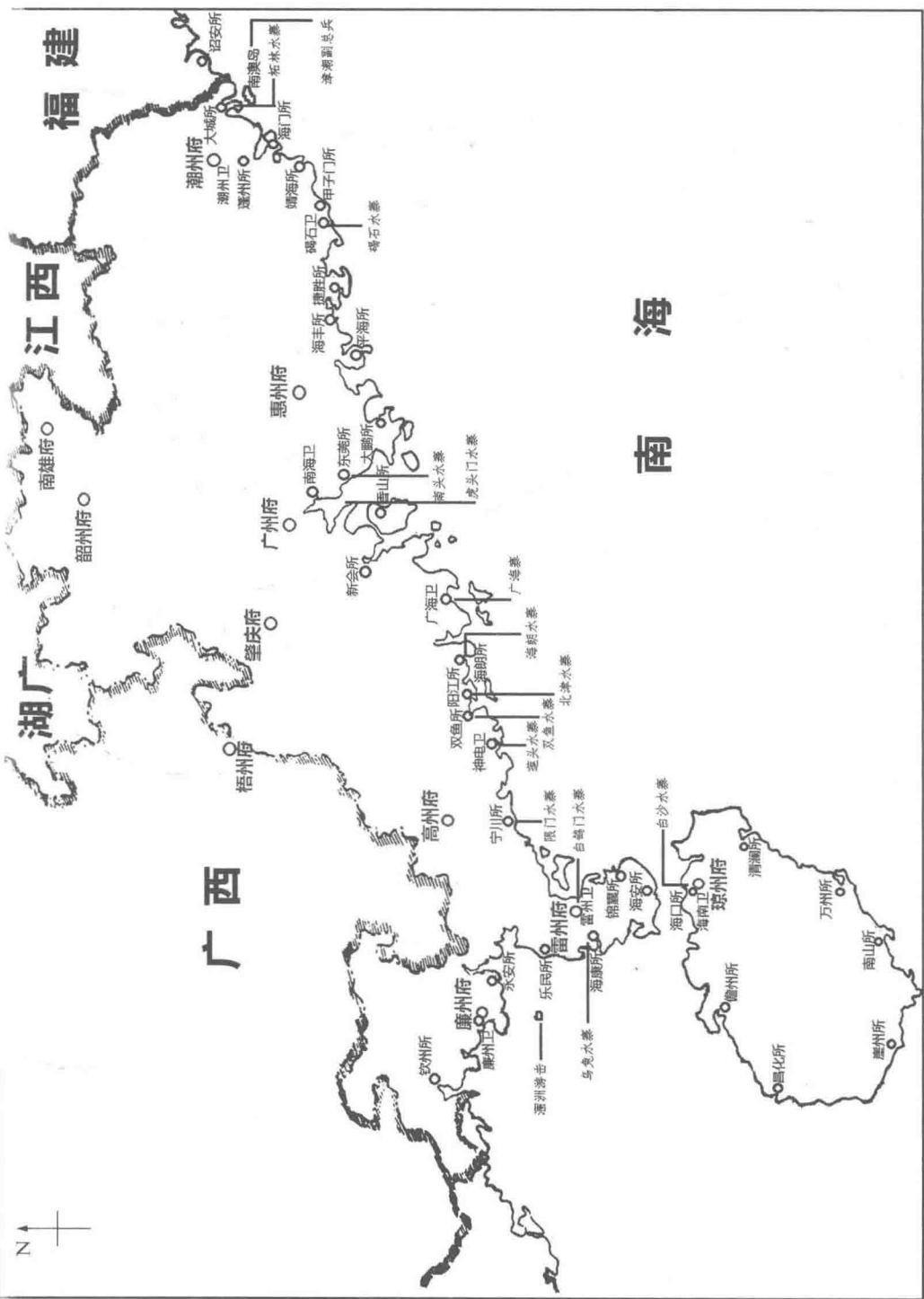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74,000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00-4

K·2375 定价：64.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明代广东沿海卫所、水寨分布示意图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已有研究的检讨	3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16
第二章 山海相通与倭夷海寇问题的产生	18
一、海门、湾澳、岛屿与风汛	18
二、沿海冲要	29
三、三路分守格局	42
四、倭夷海寇问题	48
五、小结	53
第三章 备倭官、备倭军与备倭船：明前期海防体制及其走向	64
一、防海备倭与明初沿海社会	64
二、备倭官、备倭军和备倭船	84
三、山海盗寇与海防危机	108
四、小结	121
第四章 军事财政改革与兵船雇募制之展开	123
一、军饷与兵船：正德至嘉靖初年的海防改革及其影响	123
二、柘林兵变与吴桂芳的应对策略	141

三、吴平之变与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酝酿展开·····	156
四、曾一本之变与闽广合剿海寇的政治较量·····	163
五、小结·····	183
<b>第五章 沿海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确立和运作·····</b>	<b>185</b>
一、“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漳潮副总兵之建置·····	185
二、沿海水寨的增置调整·····	192
三、“珠禁”问题与濶洲岛的弃守和设防·····	206
四、水寨兵船防御体系的运营构造·····	219
五、小结·····	235
<b>第六章 结语·····</b>	<b>245</b>
一、时局走向与突发事变对海防体制的影响·····	245
二、改革进程中的政治较量和人事纠葛·····	247
三、多元力量竞争的海洋局势与国家力量的延伸·····	249
<b>征引文献及书目·····</b>	<b>252</b>
一、文献史料·····	252
二、研究论著·····	257
<b>后记·····</b>	<b>269</b>

## 插图目录

图一	珠江三角洲水道、口门及附近港湾形势 .....	19
图二	王鸣鹤《登坛必究》载录广东船式 .....	26
图三	嘉靖《海丰县志》载《海防之图》 .....	34
图四	柘林水兵进逼省城路线示意图 .....	146
图五	《三省备边图记》之《漳潮征海寇图》 .....	174
图六	《三省备边图记》之《柘林破海寇图》 .....	174
图七	《三省备边图记》之《连澳攻海寇图》 .....	175
图八	《三省备边图记》之《南澳平海寇图》 .....	175
图九	《三省备边图记》之《平海寇升赏图》 .....	176
图一〇	北津寨地图 .....	199
图一一	广海寨图 .....	205
图一二	明代濶洲岛及其周边政区形势示意图 .....	206
图一三	《岭西水陆兵纪》载船式图 .....	234
附图一	《苍梧总督军门志》载六水寨图 .....	236
附图二	《筹海重编》载广东沿海舆图 .....	237

## 插 表 目 录

表一	明代广东沿海卫所情况·····	76
表二	明代广东沿海巡检司·····	80
表三	明代海南卫备倭军的构成·····	97
表四	明代碣石卫旗军情况·····	99
表五	吴桂芳筹划水寨情况·····	161
表六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篇目内容·····	172
表七	广东海防官兵情况·····	220
表八	万历年间广东沿海水寨游击情况·····	223
表九	沿海六水寨分哨结报情况·····	224
表一〇	莲头寨、限门寨分哨结报情况·····	227
表一一	《苍梧总督军门志》载水寨船式、兵夫、列队及 军器情况·····	229
表一二	《岭西水陆兵纪》莲头寨、限门寨船式兵夫及 器药情况·····	232
附表一	明代广东政区情况表·····	54
附表二	广东倭夷海寇事略·····	55



# 第一章 绪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募兵取代卫所军成为国家的正规常备军,以之应对内乱和外寇,<sup>[1]</sup>是明代军事史上一大关键转变。在1937年发表的《明代的军兵》一文中,吴晗先生对此已有扼要阐述:

从养军三百万基本上自给的卫兵制,到军兵费完全由农民负担,国库支出;从有定额的卫军,到无定额的募兵;从世袭的卫军,到雇用的募兵,这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sup>[2]</sup>

梁方仲先生同时期发表的《明代的民兵》对转变的过程论述尤详。他进一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前期起自太祖起兵至宣德间,或临时募集,或于乡农内简选,或按户抽丁,其法不一,主要任务是防御盗贼和守卫要塞;中期自正统至嘉靖中期,民兵应用渐广,除守卫乡里、捍御边境外,应付内乱和外寇无不依赖民兵;后期自嘉靖中叶至明末,卫所军衰落以后用民兵,民兵衰落后乃全用募兵。总而言之,“卫所军有主兵客兵之分,主兵即本地卫所之兵,客兵乃调他所卫军来戍者。主兵疲敝故调客兵,客兵疲敝则以民兵代之,民兵疲敝又练习土著或召募新兵以代之,这是嘉万以来的趋势”。<sup>[3]</sup>

[1] 有关明代以“北虏”、“南倭”为中心内乱和外寇的扼要描述,可参见傅衣凌主编,杨国楨、陈支平著:《明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吴晗:《明代的军兵》,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收入氏著:《吴晗论明史》,武汉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3] 梁方仲:《明代的民兵》,原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收入刘志伟编:《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275页。

募兵取代卫所军的军事变革在海防体制的变化上也有体现。众所周知，明代是中国海防体制全面建立的关键时期。<sup>〔1〕</sup>明初以卫所制度为基础，形成了沿海卫—守御千户所—营堡—水寨—烽墩的防御架构和汛期巡海出哨机制。明代中后期随着卫所制度逐渐废弛，山海鼎沸，当局无法依赖原有军事体制处变应敌，以水寨兵船雇募制为核心的新的海防体制在沿海各地相应出现。《明史》所谓“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sup>〔2〕</sup>说的就是当时沿海地区的普遍情形。在广东地区，地方文献往往将这一变化概括为“备倭之制遂变为水寨”，万历《雷州府志》的描述颇有代表性：

国初自闽浙至广东沿海一带俱防倭。故雷制卫所各造战船，择本卫指挥一员提督，各所官管领众哨，拨内外四所旗军七百名，分上、下班防守。隆庆初年以官军失机革去，始设白鸽寨于通明港，添设钦依把总一员领兵驻扎防守，而备倭之制遂变为水寨矣。<sup>〔3〕</sup>

显而易见，从卫所到水寨，从官军到募兵，“备倭之制”如何“变为水寨”适为理解明代海防乃至整个帝国军事变革的关键问题，值得深究析论。此为笔者开展这项研究最主要的动机或出发点。

就研究区域而言，在明代中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倭患”自浙、闽两省向南迁延，广东山海盗寇层出不穷，成为海防危机最严重的地区。徐阶、张居正、谭纶、杨博、吴桂芳、张瀚、刘尧海、俞大猷、戚继光等一大批明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刘香、郑芝龙等海上巨寇，以及先后来华寻求贸易的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势力都直接牵涉其中，广东地区不失为考察海洋局势变动下南中国海防实态的上选。

〔1〕 一般认为，明代以前沿海各地已经存在地方性的防御设施，由于这些防御设施不是对抗外来入侵者，所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防，《中国海防史》将之称为“海防的萌芽”，或“海防前史”，防御体系的真正形成则在明代。参见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22《外国三·日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352页。

〔3〕 万历《雷州府志》卷13《兵防志二·兵船》，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第356~358页。

基于此,笔者试图将国家海防体制置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场景,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分析,从运作机制、地区形势、人事背景、社会影响等多个层面梳理明代广东海防体制转变的基本脉络,揭示国家海防制度运作的地区实态和历史细节。诚然,本书的相关论述建立在前辈时贤对明代海防问题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得益于华南区域史的先行研究。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回顾相关研究的学术脉络,检讨主要的研究成果,从而说明本书的思路和力求创新之处。

## 二、已有研究的检讨

有关明代海防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被置于倭寇史、军制史和海疆史三个传统学术脉络之下。已有成果相当丰硕,为我们勾勒出明代海防体制的概貌和趋向。近年来,历史学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通过区域的、个案的研究揭示了一时一地的海防实态,则从许多历史的细部探究了国家制度的地方实践。

### (一) 倭寇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

终明一代,倭寇海盗对东南沿海地区的侵扰时有发生,以嘉靖到万历年间祸害最烈。平息倭乱一时成为国家要政,有关海防御倭的著述大量面世,既有专记倭国倭情者,也不乏专门讨论海防地理及御倭策略、战术的兵书,<sup>[1]</sup>奠定了日后研究的基础。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倭寇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李晋华、黎光明、陈懋恒、吴重翰、孟锦华、王崇武等一批学者在日寇加紧侵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借古鉴今,以历史上的倭乱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研究,<sup>[2]</sup>最有代表

[1] 参见朱莉丽:《倭寇之乱下明朝士人对日本的研究》,收入陈尚胜主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109页;朱莉丽:《纷扰的海域与错杂的日本像——倭寇背景下明代人的日本认识》,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第115~128页;陈列:《明代海防文献考》,收入谌小灵主编:《明清海防研究》第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128页。

[2] 参见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之四,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重印;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专号之六,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重印;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孟锦华:《明代两浙倭寇》,国民出版社1940年;吴原:《戚继光》,重庆正中书局1934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

性的著作有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及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二书。

黎光明的《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从明朝御倭军队来源探讨倭乱，分上下两篇，上篇述沿海卫所军腐败，不能不调客军御倭的海防背景，下篇分述从各地调遣的各种客军的来源、组成和作战得失等。作者指出“此书之作，只注重于调遣军队”，<sup>〔1〕</sup>但全书专论当时招募客兵应变的军事变革，立意新颖，切中要害，不流于浮泛，大别于同时期其他倭寇研究著作。

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全书近10万字，论倭寇来源、猖獗原因、各省倭祸、倭寇首领等最为详尽，并有专章讨论“倭寇之戡定”，对城戍、战船、将帅、兵士、民众等海防体制的各个环节均有简述。她特别注意到战船的重要性，指出“卫戍虽固，倭从海上来，迎击追剿，咸赖水师，故战船尚矣”，<sup>〔2〕</sup>也注意到船只征募和船制的地区差异，指出“明初所造船只，岁久废败，倭患起，临时征募渔船，或得胜，则仿制以用。故嘉靖以后之船制，参差不一”，<sup>〔3〕</sup>认为“大抵沿海各地习惯不同，船之式样，因地制宜，名称亦随之增改。每卫所有船只，大小参配，各有其用”。<sup>〔4〕</sup>

同时期的一些学者，如王庸、吴玉年、王婆楞等，则致力搜集整理海防御倭史籍。<sup>〔5〕</sup>其中以王婆楞的《历代征倭文献考》最为可观。全书摘录各家传记、奏议、笔录、简牍、说部二百余条，所记始自周代，以明代倭寇问题所占篇幅最多，约居全书三分之二，作者不仅“蒐集往古征倭史实，取证于文献”，同时“日系以按”，按语内容“或补文献之不足”，“或释文献之涵义”，“或作前后事实之连系”，“间亦申述著者之意见”，<sup>〔6〕</sup>堪称倭寇史料汇编，为入门者提供了指引。

早期的倭寇研究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重在描述倭患的破坏和

〔1〕 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第2页。

〔2〕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第174页。

〔3〕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第175页。

〔4〕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第177页。

〔5〕 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清华周刊》第37卷第90期文史专号，1934年；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4、6期，1934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其中王庸、吴玉年二文俱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之六《明代边防》，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205～252页。

〔6〕 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第2页。

明军的平寇战争,或表彰御倭将帅,或痛陈官府腐败,表达了较为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延续至五六十年代。前述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于1957年再版重印,李光璧的《明代御倭战争》、周一良的《明代援朝抗倭战争》等题材相近的著述也相继刊行。<sup>[1]</sup>

值得重视的是陈文石1965年发表的《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sup>[2]</sup>作者从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入手分析私贩贸易与寇乱的关系,说明私商、海盗与倭寇结合的祸乱起因,对私贩转为海盗以及官府的剿寇策略和行动有较详细的描述,隐含了从沿海社会变迁思考寇乱发生发展的新思路,是同期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兴起对倭寇起因、性质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经济贸易因素切入,试图回应当时热议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sup>[3]</sup>如戴裔焯在《倭寇与中国》一文中指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不是外族入寇”。<sup>[4]</sup>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裔焯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及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sup>[5]</sup>其他相关的专题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sup>[6]</sup>

此后的倭寇研究,由于焦点往往放在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日关系)和海

[1] 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

[2] 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收入氏著:《明清政治社会史论》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117~176页。该文是作者硕士论文《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大文史丛刊1966年)第6、7章的扩充。

[3]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较为深刻的回顾和检讨,参见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情结”》,收入氏著:《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4] 戴裔焯:《倭寇与中国》,《学术研究》1987年第1期。

[5] 戴裔焯:《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这一时期的论文非常多,无法一一列举。较完整的倭寇研究书目,参见沈登苗:《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10月。

洋贸易上,重在揭示倭患起因、性质及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关系,兼及海防设施、军事策略和战役战事,从倭患检讨海防运作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sup>[1]</sup>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视从沿海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理解寇乱的产生,有助于揭示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的地区进程。<sup>[2]</sup>新近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倭乱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倭寇问题的研究面向,<sup>[3]</sup>但基本与海防问题无涉。

最近30年来研究倭寇问题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当推已故台湾学者郑樑生教授。<sup>[4]</sup>郑氏1981年出版《明史日本传正补》,<sup>[5]</sup>1985年出版《明代中日

- [1] 例如,研治明代海外贸易史的陈尚胜把“嘉靖倭乱”置于明代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中考察,指出“明朝政府曾以海防为由,消极地限制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结果不但造成中国海外交通的衰落,而且也激化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矛盾,反而又冲击了海防的安全,嘉靖倭患就是这种恶果的表现”。参见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近年讨论倭乱与海外贸易关系的代表作,有王慕民的《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明代浙江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衰》(海洋出版社2011年),其研究思路是“研究明代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与浙江私人海上贸易和江南商品经济的关系”,讨论的是嘉靖“倭乱”如何“阻碍了浙江乃至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和向近代方向演化的历史进程”(第2~3页),仍未超脱80年代倭寇研究的问题意识。真正从倭乱本身探讨海防建设的专题研究,参见张德信:《嘉靖年间海防重建与倭寇溃败——兼及中日关系变化与断绝》,《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第247~258页;王日根:《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 [2] 这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参见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年;张增信:《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1567~1644)》,《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3辑,“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90年,第313~344页;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收入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73~106页。
- [3] 吴大昕:《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明代研究》第7期,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04年;吴大昕:《明日朝鲜战争与江南的倭寇记忆》,《史忆》第11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刘晓东:《嘉靖“倭患”与晚明士人的日本认知——以唐顺之及其〈日本刀歌〉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吴大昕:《倭寇形象与嘉靖大倭寇——谈〈倭寇图卷〉、〈明人抗倭图〉与〈太平抗倭图〉》,《明代研究》第16期,中国明代研究学会2011年;王鸿泰:《倭刀与侠士——明代倭乱冲击下江南士人的武侠风尚》,《汉学研究》第30卷第3期,《汉学研究》编辑部2012年;刘晓东:《〈度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以〈明实录〉中的相关词汇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 [4] 有关郑樑生的学术贡献和评价,参见徐泓:《郑樑生对嘉靖大倭寇研究的贡献》,收入氏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第217~230页。
- [5] 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关系研究》,〔1〕尔后陆续编辑《明代倭寇史料》(1~7辑,1987~2005),〔2〕又撰有与倭寇相关的研究论文逾二十篇,大多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13辑,1990~2004)中,〔3〕题材遍及御倭战事、兵制、人物和史料评介等。郑樑生不仅对嘉靖间的剿倭政策和平倭战役有若干具体细致的研究,且十分重视方志和文集史料,特别对流散在日本的稀见史料进行了蒐集整理。譬如他介绍东京公文书馆发现的明万历年间侯继高撰《全浙兵制考》一书,就载有海防水陆兵员、船只及饷银等重要信息,又如他最早介绍明末郑大郁撰《经国雄略》一书,重点指明所载“海防考”的价值,均为了解明代海防的关键资料。〔4〕郑樑生的遗作《明代倭寇》(2008),〔5〕虽晚出于范中义、全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6〕但系统论述明代倭乱全貌,旁征博引,反映了作者数十年倭寇研究的基本论点,可作为该项研究的总结之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利种原因,学界能充分借鉴和吸收郑氏上述研究者寥寥。

日本学界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同样由来已久。早期较为著名者,如片山诚二郎、佐久间重男、中山久四郎、田中健夫等,多围绕中日关系(海禁政策)和贡舶贸易进行研究。〔7〕其中,1982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一书在国内有中译本,较为国人所知,该书“明朝的倭寇对策”一节专述“海防负责人的更迭”,但行文比较简略。〔8〕松浦章的《中国的海贼》

〔1〕 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同年该书日文版由东京雄山阁出版。

〔2〕 郑樑生:《明代倭寇史料》,1~7辑,文史哲出版社1987~2005年。

〔3〕 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13辑,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年。

〔4〕 郑樑生:《佚存日本的〈全浙兵制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89年第22卷第1期,第119~131页;郑樑生:《佚存日本的〈经国雄略〉》,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11辑,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137~158页。

〔5〕 郑樑生:《明代倭寇》,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

〔6〕 范中义、全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7〕 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参见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中国明代研究学会1999年,第91~106页;郑樑生:《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兼言倭寇史料》,《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10辑,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171~215页。此外,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书末列举了明治时代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有关倭寇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参考。

〔8〕 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第82~83页。

也专列一章述明代的海禁政策和倭寇活动。<sup>[1]</sup>新出的研究如太田弘毅的《倭寇：商业·军事史的研究》，则注重倭寇活动的细部研究，其中考察倭寇走私中国的烟硝、铁至日本，从日本偷运刀剑、扇子、硫磺至中国等问题。<sup>[2]</sup>

## （二）军制史脉络下的海防研究

“北虏”、“南倭”为明朝军政大事，举凡涉足明代军事制度史的研究都必然要面对边防（“北虏”）与海防（“南倭”）的问题。已有若干评述文章回顾明代军制史的研究状况。总的来说，在内容上，学界对内地的卫所、军户、军屯等制度用力较多；在地域上，则偏重北方边镇的军事防卫，对沿海卫所和海防的研究相对不足。<sup>[3]</sup>

目前可见最重要的三部多卷本军事史通论著作——《中国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和《中国历代战争史》，均把海防问题作为明代部分的重要内容来编写。《中国军事史》（7卷9册），全书以军事制度、军事工程、军事装备、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等专题为纲，朝代为目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多卷本系统研究中国军事历史的专著。该书对明代海患、海防战略部署、海防筑城、水军和战船等概说性的描述，散见于各专题卷次之中。<sup>[4]</sup>军事科学院主编的《中国军事通史》（17卷20册），体例以朝代为经、重大军事事件为纬，内容丰富。其中范中义、王兆春等军事史家编著的第15卷《明代军事史》（分上、下册）对明代海防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措施，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海防和抗倭斗

[1] 松浦章：《中国的海贼》，谢跃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该书日文版于1995年由东方书店刊行。

[2] 太田弘毅：《倭寇：商业·军事史的研究》，春风社2002年。

[3]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收入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2～355页；川越泰博：《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状况》，收入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1～259页；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高新生：《中国海防史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高新生：《明清海防史研究综述》，《明清海防研究论丛》第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6页。赵明：《明代兵制六十年之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4]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共7卷9册，约520万字，1988出版，2006年后陆续再版改为《中国历代军事制度》、《中国历代军事工程》、《中国历代军事装备》、《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等。



争”亦有条理清晰的专章论述。<sup>[1]</sup>至于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18册),分述历代重要战事,其第14册明代部分也有“东南沿海抵御倭寇战役”一章,体例上详于战略和战事评判。<sup>[2]</sup>

概论性的海防史著作,以包遵彭及张铁牛、高晓星的海军史研究开其先河,而最有参考价值者,应推杨金森、范中义的《中国海防史》。前者主要论述海防武装力量(海军)的发展历程,在明代部分侧重描述造船和水军构成。<sup>[3]</sup>后者“以朝廷的海防建设为纲”,全面论述了明代至清代后期的海防形势、海防体制、海防部署和海防斗争等。与一般的叙述方式不同,作者把明代以前的沿海设防视为“海防前史”,提出“明代以前的沿海防御,是海防的萌芽,而真正形成防御体系,则在明代”,<sup>[4]</sup>因此对明代海防防御体系的建立、整饬和相关战事着墨尤多。若将该书第一篇“明代的海防(1368~1644)”相关内容,辅以尹章义、范中义、邸富生、宋烜、谭立峰等学者的专题论文,<sup>[5]</sup>适可从宏观历史脉络揭示明代海防的基本轮廓。

在有关海防制度的具体研究中,黄中青的硕士论文《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颇有新意。<sup>[6]</sup>作者从“海上第一道防御网”的水寨与游兵制度入手,分述浙、闽、粤三省寨游的建置、巡守和作用,对水寨长官及兵员、水寨信地、战船数额及分配均有较详细的论述。遗憾的是,虽然作者力图呈现寨游制度的建立及其变迁,避免对明代海防运作的鸟瞰泛论,但由于涉及的三省沿海地域极为辽阔,不同省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千差万别,造成海防运作复杂多变,是书于此难以兼顾,错漏和误解在所难

[1] 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明代军事史》(上、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2]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6~378页。

[3] 参见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中华丛书编辑委员会1970年;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1993年。

[4] 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册,第3~5页。

[5] 尹章义:《汤和与明初东南海防》,《编译馆馆刊》1977年第6卷第1期;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邸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宋烜:《明代中期海防——整饬与变革》,《明清海防研究》第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21页;谭立峰:《明代沿海防御体系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

[6] 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宜兰学书奖励基金2001年。